

湖湘文史丛谈

【第三集】

○ 湖南省文史馆 组编

○ HUXIANG WENSHI CONGTAN

○ 湖南大学出版社

湖湘文史丛谈·第三集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年·长沙

目 次

湖南居民与民族的历史变迁	伍新福 (1)
苗族姓氏考	伍新福 (13)
新晃——夜郎古邑考	弘 征 (22)
李东阳与茶陵诗派	伏家芬 (30)
《潇湘八景图》考	刘国强 (45)
魏源与佛教的因缘	胡光曙 (52)
湖湘学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陈先枢 (57)
简说湘军及其历史影响	刘泱泱 (66)
邓湘皋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兼论近代湖湘文化	弘 征 (71)
左宗棠平议	刘泱泱 (78)
从黎氏八俊看湖湘文化精神	彭文忠 (83)
沈从文风雅拾遗	伏家芬 (90)
清代方志形成高峰的原因及清代湖南方志的主要特点	李龙如 (97)
浅谈烟花诗词	刘 旭 (103)
唐代长沙窑几件诗文瓷壶赏析	谈雪慧 (107)
湖湘文化信息源的采集与分析	李 湘 (114)
樊锥及其维新思想评述	罗海兵 (121)
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三题	杨 柳 (126)
易拔与识山楼	易凤葵 (130)
一片丹心长报国	
——忆先父刘公武在抗日战争前后的艰难岁月	刘 晓 (135)
白马将军方鼎英	叶 浓 (140)
抗日将领霍揆彰佚事	刘才武 (144)
吴剑学将军传	吴容甫 (148)
漫谈近现代湖南外交的几位名人	周千里 (155)
张经武的传奇人生	任志伊 (161)

“其奈长沙后进何?”

——毛泽东与易白沙	黄露生 (166)
黄宜人行述	杨昌济 (171)
张百熙的政治理想及其崇高风范	谭承耕 (173)
磨剑室主与知生靡乐斋主	
——柳亚子和傅屯艮的交谊	李海珉 (180)
几间老屋万卷藏书	
——晚清数学家丁取忠	王晓利 (187)
教书育人 潜心学术	
——皮名举教授	李长林 (190)
胡元倓先生评传	刘瑞清 (194)
杰出的教育家匡互生	张志浩 (206)
湖湘现代名人刘建绪	湛 震 (210)
湖南著名教育家周调阳	曾弥高 (214)
刘永济生平及著述	程千帆 (219)
忆恩师柳敏泉先生	马少侨 (230)
回忆外祖父陈墨西	王 壁 王 延 (235)
怀念羊春秋	李 蟠 (238)
贺绿汀与严怪愚	严 农 (245)
怀念四哥陈云章	陈述征 (251)
瑕瑜互见的蔡季襄	彭青野 (256)
湘剧名票胡绳荪	胡渐逵 (260)
送别俞润泉同志	李 锐 (262)
从周达武故宅谈到长沙蛻园	
——关于刘蛻的故事	谭绪纘 (265)
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荐与评价	胡有猷 (268)
湘潭历史上的状元、榜眼与探花	赵 斐 (273)
旧时代的帮会	李寿冈 (276)
张舜徽先生治学著述轶事	李绍平 (282)
程潜组织诗社为毛泽东祝寿	黄 琳 (289)
旧时报人悲愤录	伏笑雨 (294)
仓石日记中的杨树达、皮锡瑞、陈寅恪	段 炼 (299)
黎氏三院士与广益中学	刘 磊 (302)
钱基博先生在蓝田国师	彭锦棠 (305)

巍然资水一高台

——著名音韵学家曾远乾与桃江凤凰阁 龙玉牛 胡则丘 (311)

傅熊湘先生二三事 廖新民 (315)

夏鼐与湖南文物普查 吴铭生 (318)

鸿才鸿图 大德大年

——记湖南日报原社长朱九思同志 柏 原 李冰封等 (321)

出师未捷身先死

——章士钊先生在香港 陈书良 (330)

终生相知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友谊 徐德驹 (334)

由长沙往昔的租书社想起 许 康 (342)

近代湖南茶业的勃兴 陈先枢 (350)

毁家兴学 为国育才

——先父胡有猷先生创办林翼中学纪实 胡渐逵 (355)

三湘子弟兵南丹剿匪记 龙德强 (362)

唱土地：梅山文化中的独特民俗 胡光曙 (367)

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意识 刘 洋 (374)

有趣的侗族择偶求婚 君 林 (377)

引人注目的少数民族头巾和头帕 君 林 (382)

妙趣横生的“挤油尖” 杨盛科 杨光清 (385)

湖南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回眸 吴铭生 (386)

诗圣之哭泣与启示 余德泉 (389)

韩愈在湖南的手迹和碑刻 刘国强 (395)

岳麓山的抗战遗迹 胡滔滔 (403)

遭日寇枪杀从血泊中滚爬出来

——我亲身经历的日寇厂窖大屠杀暴行 杨乃一 (411)

两张文书藏品见证“衡阳保卫战”的血雨腥风 张才军 (415)

奇特的江永女书 田武登 (419)

靖港古镇的记忆 王晓利 (423)

千年古庙

——陶公庙今昔 周 敏 (429)

黄鹤将军访谈录 戴铁珊 (433)

汪炳璈联艺管窥 胡静怡 (435)

湘“目连”与湘风 文忆萱 (440)

钟王易顺鼎优秀诗钟选评	吴容甫 (448)
《万里平生师友品题》序	虞逸夫 (458)
张家界史话	戴楚洲 (459)
五溪访古散记	李鸣高 (463)
后 记	(471)

湖南居民与民族的历史变迁

伍新福

湖南是中国内地一个以汉族居民占多数，但还有土家、苗、瑶、侗、回、白等民族聚居的多民族省区，而其居民内部结构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变迁又相当大。近几年因承担编撰《湖南民族关系史》的任务，有机会涉猎和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探究，形成了一些看法。现仅就湖南境内的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源流、形成、发展及其分合演化的基本史实和本人的观点，作如下概述。

（一）湖南地区的初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古人类栖息和生活于湖南境内。至今全省范围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和地点共200多处，出土的各种旧石器数以千计。遗址的分布，以沅、澧二水流域为多，但在湘、资流域也有发现。其中，年代最早的，如浏阳市永安旧石器遗址，属中更新世晚期或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5—20万年。1992年12月，在石门县燕儿洞旧石器文化遗址内，发现1件人类右股骨残段化石。这在湖南是史无前例，填补了长期以来湖南境内无人类化石的空白。考古界将留下这段股骨化石的古人类称之为“石门人”，其生存年代为晚更新世，距今在2年以上。

距今9千年前左右，湖南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据初步统计，目前湖南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达2千多处，分布范围很广，遍布全省各地区。生活遗址的大量增多和分布地域的扩大，说明新石器时代生活繁衍于湖南境内的先民人数，较旧石器时代已大有增加。同时，各地的新石器文化的内涵和风格往往各具特点，显示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根据现有资料，考古界将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划分为澧水中下游和洞庭湖区，湘、资水中游和湘中区，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区，以及湘东、湘南区。这种划分是地区性的，主要反映了地区文化差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不同族群和不同族系的某些区别，并且与后来所形成的不同民族已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时期，湖南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湘西北、湘北和湘中地区，其文化特征可归为长

江中游的龙山文化同一文化范畴，与前期的屈家岭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而同当时活跃于这一地区“三苗”和“荆蛮”族群有着明显的关系；湘中部分地区和湘东、湘南所出现的以印纹硬陶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华南、两广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个范畴，考古界一致认为与古越人族系有关；沅水中上游地区不见鼎等三足器的文化遗存，与西南文化有明显联系，并同当地土著、后来称之为“蛮濮”民族的族群有渊源关系。

（二）湖南先楚时代的族群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界称屈家岭文化时期），湖南主要为“三苗”部落集团聚居地。据先秦文献记载，“三苗”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部落集团战争失败后，向南退却在南方所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集团。其地域是“左彭蠡（今鄱阳湖）、右洞庭”，即今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安徽、河南一部分地区。还有史料说，“三苗”曾“建国于长沙”，即以长沙为首都建立了国家。这虽然不可信，但说明洞庭湖沿岸至长沙一带是当时“三苗”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地带。《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因此遭到尧、舜、禹的多次征伐。结果“三苗”集团被打垮和瓦解。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同中原华夏族人融合了，或远徙他乡，但大部分依然留居长江中游和洞庭南北，只是暂避山林而已。后来建立楚国的楚人，及苗、瑶、侗等民族，同“三苗”都有渊源关系。

夏、商、西周三代，“三苗”已不再见诸史籍。但商、周之际，南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部落集团，即史籍所载的“荆蛮”，或称“蛮荆”。据史籍记载，所谓“荆蛮”和“蛮荆”，即指“荆州之蛮也”。而古荆州之域，主要在荆山至衡山一带，即今长江中游湖北、湖南，及相邻地区。这正是原“三苗”活动的中心地区。故学术界一般认为，“荆蛮”就是当年被瓦解的“三苗”部落成员的后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展和形成的新的部落集团。“荆蛮”族人构成当时湖南的主要居民。由于势力日趋强盛，他们成为中原商、周王朝多次大规模征伐的对象。此外，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湘江、资水以东地区和湘南，存在商、周时代的大量越文化遗址和遗存，说明当时除“荆蛮”之外，古越人在湖南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沅水中上游和湘西地区，还存在既不同于“荆蛮”，又与越文化有别文化遗存，说明商、周时代同西南文化有关联的土著居民和族系，在该地区继续生存与发展。

西周以前二三千年中，湖南主要为“三苗”、“荆蛮”和古越人及其他土著族系所聚居。但中原族系，即炎、黄部落和华夏族人，随着南征的军事行动，或由于其他原因，也有部分南迁进入湖南的。不过因为人数不多，很快也就融合于湖南境内的土著民族。流传下来的有关神话和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

了这种历史情况。如：由于同黄帝族争逐失败，部分炎帝族人被迫南迁，他们某一支系曾进入湖南，因而在原茶陵县留下了炎帝陵及其相关传说，有关帝舜“南巡狩”，道死苍梧而葬于九疑的传说，以及舜二妃自溺湘江、舜弟象和子叔均在湘南一带的传说，应是对帝舜南征“三苗”及其族人入湘的历史追忆和附会。还有在湖南境内留下的祝融峰、禹王碑等遗迹和传说，同中原的祝融族人徙入湖南，以及大禹治水和征伐“三苗”曾进入湖南有着明显的联系。在湖南宁乡、长沙、湘潭等地发现和出土的大批商、西周的青铜器，有一部分明显具有中原风格，甚至同中原商、周青铜器如出一范。考古界认为，其中，有些就是南下的商人和周族成员带来的，有些器物（特别是中原未见的铜罇），应是当地铸造的，但同南下的商、周族人带来的技术还是分不开的。此外，在湖南还发掘了少数商人墓葬。最近在宁乡县炭河里发现了大型西周遗址。这都证明，确有部分商人和周族成员迁移到了湖南境内。当然，他们大多也逐步同占绝对优势的土著民族融合了。

（三）楚国时代湖南的民族结构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楚国的征服和军事、政治势力在湖南的扩张，楚人和楚族逐步成为湖南境内的主要居民。湖南的楚人和楚族，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发迹于湖北荆山、丹水和析水一带，作为“三苗”和“荆蛮”一个主要支系的楚人，其中有楚王室宗亲、贵族、南征将士及家属、派遣的地方官吏和楚灭国移民，以及随军而来的平民和商人；另一部分，是与南来楚人融合的、原湖南另一部分土著的、但同样属于“三苗”和“荆蛮”族系的居民。此外，还融合了先已南下的部分华夏族成员和被征服的部分古越人和“蛮濮”族系成员。近几十年来，在湖南各地所发掘的楚人墓葬已达4千多座，遍布三湘四水，其数量和分布地域均远远超过古越人及其他土著族系。这证明，当时楚人和楚族在湖南居民中确实已逐步占据了优势和主导地位。

若按司马迁《史记》所编排的商周以前的帝王世系，楚人乃高阳帝之苗裔，而高阳为黄帝之孙意昌之子，楚人则属炎、黄部落和中原华夏族系。对于这种传统观点，楚史和民族史学界现在已多持否定态度。楚人有自己独特的习俗，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即《孟子》所称的“南蛮貊舌之人”，应是南方土著的“蛮夷”，原为“三苗”的一部分，后属“荆蛮”集团中的一个支系，只是他们较早接触到中原的华夏文化，比其他“蛮夷”发展更快些，在南方建立和发展起一个赫赫大国——楚国。并逐步“华夏化”，后来成为南方和湖南汉族民族最初的主要来源和基本组成部分。这一观点我在《中国苗族通史》以及《楚人、楚族与苗族》等专论中已有详细论证，这里不再赘言。

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存和考古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湖南，人数和分布

地域仅次于楚人而居第二位的是古越人。但自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湖南的古越人有明显的变化。春秋早、中期，越人墓葬广泛分布于整个湘江流域及资水中上游地区，即湘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各地，而以湘南地区最集中。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对湖南全境的征服，湘北、湘中地区，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逼南迁，留居当地的土著越人已大大减少。反映在考古文化上，是这些地区越人墓葬的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遍布各地的楚墓。湖南地区则不同，在整个战国时期，仍然聚居着大量越族，构成当地居民的主体。如资兴县旧市所发掘的84座战国墓，其中40座是越人墓，而在其他楚墓中也多见古越人文化的因素。学术界大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今天湖南及湘、桂、黔三省的侗、壮民族，主要就是由这些古越人的后裔演化而成的。

在湖南西部地区，澧水和沅水中、上游，即史称的“武陵五溪”地区，春秋战国时代，居住着土著“蛮、濮”民族及部分“巴人”。所谓“蛮”，即原“三苗”和“荆蛮”集团中尚未同南下楚人融合的一些支系和族群，楚人统称之为“群蛮”。“濮”，有时也称为“蛮”，由于支系和族群繁多，楚人统称之为“百濮”。楚王蚡冒和楚文王向沅水中游地区扩张时，名之曰“启濮”、“伐濮”和“开濮地”，这说明当时这些地区，除“蛮”之外，还居住着许多属于西南“濮”人族系的居民。近一二十年来在湘西地区所发掘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中，有一批带瓮的上坑竖穴墓，其形制和随葬器物不同于楚墓，很可能就是当地土著“蛮濮”民族的墓葬。这些墓葬出土了一种形制和风格均有别于楚式剑、越式剑的青铜短剑。湘西和相邻的黔东南地区，还出土了大批中原和楚人的遗物中所未见的青铜镞于。考古界认为，这些青铜器应属当地“蛮濮”民族的遗物。今天自称“毕兹卡”（即“本土人”）的土家族、苗族、瑶族和仡佬（革佬）族洞“武陵五溪”的这些土著“蛮濮”族群，都有着直接的联系。（一说今天的侗族也源于“濮”，可进一步研究。）

古代巴人，相传最初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周初建立巴子国。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受强大的楚国势力所逼，巴国势力逐步向西退缩，其中心地出鄂西转至川东（今重庆市地）。由于湘西与鄂西、川东毗邻，春秋时代可能即有巴人进入湘西相邻的益阳等地出土的“巴式剑”，以及属战国后期的带虎钮的镞于，应是巴人的文化遗物。此外，在沅水中游还发掘出少量的巴人墓。这说明最迟在战国中、后期，确实有部分巴人进入了湘西和武陵五溪地区。后来这部分巴人融合于当地土著“蛮”人部落，成为土家族的来源之一。

（四）湖南汉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结构变迁

秦汉数百年间，中国境内主体民族、统一的汉民族初步形成。在作为秦汉统一封建国家一部分的湖南，汉民族同样也逐步形成并成为湖南境内的主体居

民。但湖南汉民族的主要成分，并不是中原的华夏族系，而是在春秋战国的500多年间已逐步“华夏化”的楚人和楚族。其中，当然也包含着秦汉时代，由于多种原因，从中原和关中地区不断南下进入湖南的原华夏族系的成员。如秦始皇从关中征调50万大军“戍五岭”，分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一军“守”九嶷。谭城，即今靖州、会同、黔阳、通道等县地；九嶷，指九嶷山，今宁远、蓝山、江华等县地。即五分之二来自关中的秦军驻屯在湖南境内，后来落籍湖南的当不在少数。又如据《后汉书》（卷六十二）记载，东汉永初二年（108），黄河流域“连年水旱灾异”，故将一大批“饥困”百姓徙往当时的荆州，即今湖南、湖北一带。正是这些相继进入湖南的北方和中原华夏族系成员，与已逐步“华夏化”的楚人，以及部分土著“蛮越”族成员相融合，形成了湖南境内的汉民族。而近几十年来所发掘的，遍布湖南各地、形制和随葬器物均有别于楚墓的成千上万的汉墓，以及统一文字（秦篆、汉隶）和统一货币（五铢钱）等在全境的通行，都说明汉民族和汉文化确实已在湖南占据了优势地位。

此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一直是湖南境内的主体民族。但其结构和成分曾多次发生变迁。特别是国家处于分裂战乱之际，或王朝统治动荡和旧更替期间，变迁就更大。从东汉末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的近400年间，大部分时间战乱频仍、灾祸连年，因此北方和中原人口多逃亡江南，至西晋末年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南朝萧梁时湘州（治今长沙市）刺史张纘任内，招纳“流人”，结果“户口增益十余万”。（《梁书·张纘传》）如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阴铿，其祖本甘肃姑臧（今武威）人，就是在东晋末年辗转南下，后移居南平郡作唐县（今湖南安乡县），遂落籍湖南，繁衍子孙。

唐朝“安史之乱”后，战乱频繁，又引起北方人口大批南迁。据记载：“中原多故，襄、邓百姓及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旧唐书·地理志》）“江、湘”，即当时的江州、湘州，今湖北、湖南。唐末五代，河南鄆陵人马殷率10万大军入据湖南，以长沙为中心建立楚国，实际上也是中原人进入湖南的一次移民浪潮。马氏楚国灭亡后，马氏家族及其亲信虽被强迫迁往金陵（今南京）等地，但这只能是当年进入湖南的10万兵将的一小部分，其中除横尸沙场者外，大部分后来都只能落籍湖南了。在马氏家族进入湖南的前后，还有一些大姓豪族也从境外徙入湖南。如马楚任命为天策府十八学士之一的廖匡图，其先世为虔州赣县（即今江西赣县）人，唐昭宗光化元年（898），举族3000多人迁入湖南，后落籍衡山。又如，天佑三年（907），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彭玕率所部及其族1000余人归附马楚，马殷以玕为郴州刺史，其弟为辰州刺史。还有与廖匡图同为天策府学士的徐仲雅，原籍

陕西秦中，也是唐末五代移居长沙的，遂成为湖南长沙人。这都增加了湖南境内汉民族中的外来移民的成分。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人口再次大批南徙，又大大增加了湖南汉民族中外来移民，特别是北方移民人口的成分。据记载：“靖康之难”后，“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移居“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的“荆湖、两浙”。（《文献通考·田赋考》）“荆湖”即今湖北、湖南。当时进入湖南境内的应不在少数。如湖南汉族中的张姓，不少都源于唐末出长安（今西安市）南下、避难于四川绵竹的国子监祭酒张琳。南宋时宰相张浚为绵竹张氏之后。张浚东下抗金，长期滞留湖南，卒葬衡山脚下。其墓在今宁乡官山。子张栻留居长沙并主讲岳麓书院多年，弟杓落籍于湖南宁乡龙塘。后张氏子孙在湖南繁衍，散居于宁乡、安化、益阳、新化、邵阳、祁阳、汉寿、沅陵、溆浦、泸溪等地。南宋灭亡后，在安化、宁乡一带起兵抗元的张虎，即张栻的曾孙。张虎兵败被杀。其子张惟考遂隐居安化三洲，为今天当地张姓之祖。又如，南宋末年进士、官至大理寺丞的杨大异，醴陵人。先世原籍弘农（今河南灵宝），避中原丧乱南迁，遂落籍湖南醴陵。

由于汉民族自魏晋以后的这类主要由北而南的不断迁徙，至宋元之际，在湖南境内汉民族居民中，南来的北方和中原人的成分显著增加，而原以楚人为主的土著居民所占比例则大为减少。这是湖南汉民族内部结构的第一次大变迁。

湖南汉民族人口最大的一次流徙和内部结构又一次大嬗变，发生在元明之际和明朝初年。与此前历代大多由北而南流动不同，这次主要是从东往西迁移，即史称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原因是元末明初的连年战祸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废、庐舍为墟，原有人口大量散亡。而流入当时地广人稀的四川的湖南人又特别多。据记载：“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结果湘中地区的湘潭（含今株洲）一带的原居民，即唐宋前的土著，只剩下“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嘉庆《湖南通志》卷六十）豫章，即今江西省地。湘东的醴陵县，“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后来的居民，均明初从外省迁来的，而“尤以江西为最多”。据统计，醴陵县境内明代从江西共迁入 296 族，而其中 200 族是洪武年间迁来的。（同治《醴陵县志》卷六）湘西地区，据光绪《永定乡土志》所载：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38 大姓 60 始祖中，有 24 姓 33 始祖是明初从外省迁来的，而其中 20 始祖来自江西。沅陵县，“今所指土著十之九皆江西人”。（民国初《沅陵县志》卷六）

明代所发生的人口大流动，导致湖南境内汉民族的成分和结构发生了一次

根本性的变化，即原土著和宋元以前来自北方和中原的汉族居民，大部分或外迁，或灭绝，原籍江西以及江浙地区的移民在湖南汉族人口中占据优势地位。从明清以来所撰修的谱牒看，现今湖南境内汉族各主要大姓，几乎都是说自己祖籍江西某地，或江苏、南京，而且大多数都是明代移居湖南的，这应是可信的和有据可考的。如以王夫之、王文清、王闾运、王先谦，即“湘学四王”为代表的湖南望族王姓为例。王夫之属衡阳王氏，其祖原籍江苏高邮，明永乐年间入湖南，落籍衡阳。王文清属宁乡王氏，系江西吉安王氏的分支，其祖于永乐初以指挥使屯长沙卫（今宁乡铜瓦桥一带），遂落籍。王闾运属湘潭王氏，源出太原王氏，其祖元末避乱居江西赣州，两代后再徙湖南。始迁衡阳，再迁湘潭，后子孙繁衍于湘潭、长沙各地。王先谦属长沙王氏，先世为江宁府（今南京）人。正德年间，有王沾者通判岳州府，遂留居湖南，落籍长沙城北福善坊，是为长沙王氏之祖。湖南王氏四大主要支派，两支来自江西，两支祖籍江苏，而均为明代迁入湖南。

清初，湖南为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和南明势力抗清的重要战场，后又有“三藩之乱”和吴三桂叛踞湖南。数十年战乱，再次使湖南的居民大批家破人亡和流离失所，造成湖南历史上汉民族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较大的流徙。但这次流徙与明初相同，主要也是由东而西，即江西等地居民迁入湖南，而湖南人又再次大批进入四川、贵州。故魏源依然称之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古微堂内外集》卷六）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湖南汉民族中江西等地的移民的比重。

明清之际，汉族人除主要从东而西迁入湖南之外，其中也有一些支系和族群由南而北回徙，进入湖南。这主要是聚居于湘东和湘东南的酃县（现名炎陵县）、桂东、汝城、茶陵、攸县，以及平江、浏阳部分乡镇的“客家”人。如据1990年的统计，酃县全县总人口为175759人，其中“客家”人占60%，即10万以上。“客家”为汉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和族群，唐宋时南迁，主要聚居于广东东南部。湖南酃县等地的“客家”人，主要就是明清之际从广东迁来的，少数来自福建。如酃县“客家”的饶、邬、叶、伍等姓氏，都是清康熙、雍正年间从广东梅县迁来的。在酃县所调查的164支家族中，有60支是清代由广东迁来的“客家”，9支来自福建。（新编《酃县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又如浏阳县，原籍可考的“客家”人共39支，其中36支祖籍广东平远等地，清初迁入的有黄、刘、叶、邓、周等姓31支。他们聚居于东乡和南乡山区，一直保留了“客家”语言。（新编《浏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

自明清的大迁徙后，湖南汉民族内部结构基本稳定下来，在湖南的分布格

局亦大体确立，此后再无什么大的变迁。与此相对应的，是近代湖南汉语的几大方言区的形成。湖南汉语现在分为四大方言：“湘语”区，以湘中和湘、资二水中游地区为主，包括长沙、湘潭、益阳以至衡阳等各市、县。这与扬雄《方言》中所称的“南楚”、“江湘”、“湘沅”方言区基本一致，应渊源于楚人和唐宋之前湖南土著汉族居民的方言。“西南官话”区，主要包括湘北、湘西和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从岳阳、常德、张家界、沅陵、吉首，至怀化、洪江、靖州等市、县，以及湘南部分所谓“双语”（即土话与官话）区。这种“官话”，主要是由宋元以前历代的北方和中原移民所形成的，对所谓“湘语”亦产生很大影响。“赣语”区，主要是湖南的东部，由北而南的平江、浏阳、茶陵、攸县，以至资兴等各县市地区，此外在湘中、湘西也有分布点。这是直接由明清之际的江西移民所形成的。“客家话”，主要分布于酃县、桂东、汝城等县。这是由广东北迁的“客家”人所形成的。当然这四大方言和湖南汉族内部主要支系区分，都只能是大体上的，交错混杂和相互影响的现象很多，而且虽属同一方言和同一支系地域性差别也相当大。

（五）湖南其他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变迁

秦汉以后，在汉民族形成发展的同时，湖南境内的其他土著族群，也历经分合演化，相继形成和发展为各个单一的民族，现统称之为少数民族。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称谓、结构及分布地域，变迁较大。

在两汉时期，先秦时原以“蛮濮”、“夷越”、“巴”人等名相称的族群，常常被统称之为“蛮”，且按所处地域的不同，又常在“蛮”之前冠以不同的地名。从史籍记载看，当时湖南境内主要有“武陵蛮”（又称“五溪蛮”）、“长沙蛮”、“零陵蛮”、“桂阳蛮”等。这是一些以郡名相称的族群。此外，还有不少冠以县邑或其他小地名的“蛮”。如“澧中蛮”、“潯中蛮”、“酉溪蛮”、“零阳蛮”等。“澧中”即澧水中游一带；“潯中”指澧水支流潯水地区，今桑植、张家界市永定、慈利等地。“酉溪”即酉水，又称北江、白河，沅水支流，源于酉阳地区，流经龙山、保靖、永顺、沅陵。这些地区两汉时均属武陵郡。又有记载：“长沙蛮反叛，屯益阳”；“零陵蛮入长沙”；“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蛮夷”。（《后汉书·南蛮传》）可见当时湖南四大郡，包括湘、资、沅、澧四水流域，都有“蛮夷”民族分布和聚居，而其中武陵郡内又最为集中。他们甚至屯兵益阳、攻入长沙，往北一直打到湖北江陵，其人数应相当多，势力颇为强大。此时的“蛮”，完全是地域性的族群称呼，实际上包括着湖南土著的土家、苗、瑶、侗等民族的先民。史籍将“武陵蛮”、“长沙蛮”，都说成是“盘瓠之裔”，不符合史实。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陵蛮”和“五溪蛮”、“零陵蛮”，依然相当活跃，其

范围内也还有“天门蛮”、“黔阳蛮”、“西溪蛮”等局部地区性称呼。“长沙蛮”的称呼再未见诸记载，但同时“蛮”又有一些新的称号。如“巴陵马营蛮”、“湘州蛮”、“衡阳蛮”等。“巴陵”，即今岳阳、临湘等地。说明当时湘北也有“蛮夷”族活动。西晋永嘉元年（307），始析荆州之长沙、衡阳等郡置湘州，治今长沙，所称“湘州蛮”，应即两汉时的“长沙蛮”。20世纪80年代在桃源县漆家河乡出土了两方银质印章和一方铜质印章，均为西晋王朝颁发的“蛮夷率善邑君”印。说明当时桃源一带还聚居着一支人数众多的“蛮夷”民族。从分布与活动的范围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蛮”相称的民族地域，远较后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宽。

除“蛮”和“蛮夷”的称呼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族称。从史籍记载看，主要是，在武陵郡境内有“僚”人，零陵、衡阳一带有“莫徭”，学术界一般均认为，“僚”同先秦时代的“濮”有渊源关系，为后来仡佬（革佬）族先民。而“莫徭”即今天的瑶族先民。这表明，“僚”（仡佬）和“莫徭”已从“蛮”中区分出来，开始了形成各个不同的单一民族的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湖南境内土著少数民族，从名称看主要分为“蛮”、“僚”、“仡僚”、“徭”、“夷蜒”等。但仍常以其活动地域，冠以地名相称。如“武陵蛮”、“石门蛮”、“辰州蛮”、“锦州蛮”、“溪州蛮”、“叙州蛮”、“飞山蛮”、“武冈蛮僚”、“梅山蛮”、“桂阳监徭”、长沙郡“夷蜒”、朗溪“僚”等。据《隋书地理志》载，“夷蜒”又名“莫徭”，也即“徭”。新出现的“仡僚”，也就是原“濮”人的后裔“僚”。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仡”与今天侗族的自称“干”、“金”（其意为峒、洞）相近，“仡僚”应是侗族的先民，为古越人之后。唐代的朗溪县，为今会同、靖州、通道等县地；当时武冈，包括今天的武冈、城步、新宁、绥宁县地。这些地区至今仍为侗族主要聚居区之一，这些地区此时所称的“僚”，显然与“濮”和“仡佬”已没有关系，而是指侗族的先民。梅山，含今新化、安化等县地，唐属长沙郡地所说的“蛮”，实际上也就是当时长沙郡的“莫徭”和“徭”。唐辰州治今沅陵，锦州治今麻阳，溪州治今龙山，叙州治今黔阳，飞山在今靖州自治县境，所称的“蛮”，依旧是对这些地区土著名族的一种泛称，应包括着今天聚居于这些地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瑶族的先民。从分布的情况看，隋唐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生活与活动的地域较前已有所收缩，主要集中于湘西、湘南及部分湖中地区。

唐末五代，江西庐陵（今吉安）彭玕兄弟率部投奔湖南马殷，授为辰州刺史。后彭战败当地土著“蛮酋”，占据溪州，马氏又授其为溪州刺史。彭氏军家族及所率田、向诸姓部属和百艺工匠，遂落籍上下溪州即今永顺、龙山、保靖诸县地及其附近地区。彭氏数百年的割据和封闭式的统治，促进了湖南土家

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彭氏家族及其部属的部分后裔，逐步融合于当地土著“蛮”族，也就成为了今天土家族的另一个来源。

两宋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常被统称为“溪洞诸蛮”。宋王朝又曾按不同地域，将他们划分为“北江诸蛮”、“南江诸蛮”等。沅水的支流酉水又称北河，“北江”系指沅水中游及酉水流域地域；“南江”，指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辰水、巫水等地区。除此之外，史籍中以“蛮”相称的还有“梅山蛮”、“邵州蛮”、“辰州蛮”、“桂阳蛮”等。在继续统称“蛮”的同时，两宋时对瑶族的单独称呼更加常见。如“徭人”、“山徭”人，还有较多的“峒丁”、“峒民”、“洞蛮”的记载，这为后来侗族名称的由来。说明继瑶族之后，侗族在两宋时也初步形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在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两宋史籍中出现了“伧伶”称呼，学术界一般认为它应是侗族自称在历史上的一种汉译，为古越人之后。作为“蛮”族系统最重要组成部分的“苗”，从中区分出来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族称，也始于两宋。在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中，除“蛮”、“徭”、“僚”、“伧佬”之外，已多次出现“苗”的称呼。叶钱的《溪蛮丛笑·序》第一次将“五溪蛮”分成五种：“曰苗、曰徭、曰僚、曰僮、曰伧佬”。朱熹出任湖南安抚使时，招抚“苗蛮”，特于岳麓书院右侧建《谕苗台》。可见，“苗”作为一个特殊族群的概念，当时已比较明确。两宋史籍中所出现的“土丁”、“土人”的称呼，虽含义较为广泛、还不是单独的民族村的称呼，但在古“五溪”地区应主要是指土家族的先民，表明自唐末五代溪州为彭氏割据之后，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两宋时也开始逐步形成。

由于宋神宗时（1068—1085），首先“开梅山”，在“梅山蛮”地区设置安化、新化两县，并实行“变徭为汉”的政策，原聚居于这一地区的徭人，或被迫南迁，或逐步被同化。据道光《宝庆府志》（卷末上）记载：章淳开梅山，设置新化、安化二县后，“流亡渐复，而新著籍者，强半江右吉安人”，“而土户反寥寥”。即基本上就变成了以江西移民为主的汉族地区。继之，又“恢拓”南江诸蛮地区，先后设置沅州（治今芷江）、靖州（治今县城），以及渠阳、时竹等县（今会同、绥宁、城步等县地），将当地土著“苗徭”、“蛮僚”民族重新纳入统一的经制州县管理之下，进一步强化统治。这都导致两宋时期湖南境内各土著少数民族聚居和分布地区，较唐代又进一步有所收缩。

元明时期，湖南土著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已主要局限于湘西和沅、澧水中上游；其次，是湘南和湘西南。在当时留下的文献中，往往被统称为“蛮”，或“苗蛮”、“蛮僚”等，但单独记载“苗”、“徭”、“峒丁”、“山僚”、“土民”、“土蛮”，即今苗、徭、侗、土家等民族的资料日益增多。从元朝开始，“以蛮治蛮”，在唐宋羁縻州的基础上建立了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至明代在湖

南境内发展为大小十八土司。即永顺、保靖、桑植 3 宣慰司，茅冈安抚司，南渭、施溶、上溪 3 土州，腊惹洞、麦著黄洞、驴迟洞、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上洞、下洞、五寨、竿子坪等 10 长官司，两江口土舍。其地域，主要包括今天张家界市和湘西自治州所属各市县。居民则以今天的土家族为主，其次为苗族。在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湘西和湘黔边方圆数百里苗族聚居的区域内，既未设置土司，又未派流官治理，逐步形成一块独特的所谓“生苗”区。从此对苗族开始有“生苗”、“熟苗”的不同称呼。居住在“生苗”区内，不通汉语、不习汉俗的苗族人，被称为“生苗”；居住在土司或州县流官管辖区和苗汉杂居区，通汉语、近汉俗的苗族人，被称为“熟苗”。

元明时期，湖南境内少数民族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即在原土著的苗、瑶、侗、土家等民族之外，又有新的民族的一些支系和家族进入湖南境内定居。元初，一支以白族为主体的“爨棘军”，从云南北上，抵长江中游一带，后有一部分落籍桑植，繁衍为今天的湖南白族。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之后，西域“回回”（当时为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及我国新疆各族的统称），归附元王朝随征各地，其中回回人阿里罕等被派遣至宝庆路（治今邵阳市）等地为官，这是回族进入湖南之始。元末明初，大批回回人从军追随朱元璋，称“达军”，不少受派遣进入湖南，其后定居下来成为湖南回族的主要来源。自明代以后经商进入湖南的回族人也不少。湖南的维吾尔族也源于元明之际。据《翦氏族谱》记载，其先祖哈勒，为西域回部望族，从元太祖征战有功，封折冲将军，后东迁内地，历代仕元。明兴，其后人八十佐明太祖征伐，以功封荆襄都督、镇南定国将军，并赐姓翦，后来落籍常德、桃源，子孙繁衍，即今湖南维吾尔族。至今聚居于江华县境内的书、廖等姓壮族，也是元、明之际出广西迁入湖南的。

元、明时期所形成的湖南民族结构和分布格局，入清后大体沿袭下来。但也有些变化。首先，由于清王朝对湖南少数民族的多次军事镇压，特别是对苗民乾嘉起义的大规模血腥镇压，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缓慢，尤其是苗族。如据道光《凤凰厅志》（卷十一）记载，凤凰厅（今凤凰县）从康熙四十四年（1707）至道光二年（1822），全厅苗族人口由 31 221 口增至 49 605 口。前后经过 115 年的时间，仅增加 18 384 人。又如龙山县，从雍正七年（1729）至乾隆六十年（1795），全县“苗籍”人口，由 1 244 户、5 657 口发展为 1 195 户、6 138 口。66 年间，仅增加 481 人，而户数不减反减。在清代二百多年间，由于天灾人祸湖南少数民族外迁的也不少。如今天仍聚居于湖北宣恩的部分苗族和广西南丹一带的田、唐等姓苗族，都是乾嘉起义失败后从湘西凤凰、永绥（今花垣）等地迁去的。又如，自康熙到乾隆年间从晃州（今新晃）经贵州迁往湖北